

受援国经济结构、政体类型与 中国对外援助的区位选择^{*}

王雪莹^{**}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和总金额迭创新高，受到受援国的广泛欢迎，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关注中国对外援助的区位选择，在理论分析部分提出了基于对外援助利他和利己动机的分析框架，并在综合考虑西方国家对外援助偏好和受援国自身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说。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 2001—2017 年 100 个受援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支持研究假说。经济结构方面，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制造业发展水平负相关，与受援国自然资源禀赋无关；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则与受援国自然资源禀赋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中国对外援助关注受援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而非自然资源禀赋，加一个则字：而西方国家的援助则更加青睐自然资源富饶的国家。政体类型方面，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西式民主化水平负相关，与受援国政府治理能力正相关；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援助则格外偏爱西式民主国家，与受援国政府治理能力无关。西方援助在非西式民主国家的“缺位”、西式民主受援国议价能力较强、行政部门自主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我国基于 RCEP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战略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CGJ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世界政治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 王雪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性较低、受西方舆论影响较大等因素导致中国对外援助更多地流向了非西式民主国家。中西方对外援助区位选择偏好在经济结构和政体类型方面的差异性意味着双方在对外援助领域有互补合作的可能性。

【关键词】 中国对外援助 制造业占比 自然资源禀赋 政体类型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一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对外援助是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对外交流与经济合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根据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AidData）项目提供的数据，2000—2017年，中国对外援助^②规模整体呈增长趋势（见图1）。“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外援助总额和对外援助项目数更是迭创新高。援助金额方面，2016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达到1135.4亿美元（2017年不变价），2017年略有回落，为769.2亿美元（2017年不变价）。援助项目方面，2017年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达1152个。另外，从受援助部门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外援助以对经济类基础设施和生产部门的援助为主，这一援助模式体现了中国对受援国生产能力和工业化水平的关切。2000—2017年间，经济类基础设施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46.30%，生产部门援助占31.94%，政府部门援助占15.98%，社会类基础设施援助占5.78%。^③ 相比较而言，经合组织

①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关于《对外援助管理办法》的政策解读，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官网，2021-08-31，http://www.cidca.gov.cn/2021-08/31/e_1211351316.htm。

② 在本文语境下，“对外援助”等同于中国官方话语中经常提到的“国际发展合作”。在中文话语体系下，二者的含义是相近的，“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是指，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开展的多双边国际合作。”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主要职能便是“拟订对外援助战略方针、规划、政策，统筹协调援外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议，推进援外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方案和计划，确定对外援助项目并监督评估实施情况等。”考虑到国际发展合作不是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词汇，为与国内外文献对话，本文依然使用“对外援助”这一表达。参见：路阳，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2021-03-19，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2021-03/19/content_77326463.shtml，访问日期：2022年11月14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机构职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官网，<http://www.cidca.gov.cn/zyzz.htm>，访问日期：2022年11月14日。

③ 本文参考王孝松和田思远（2019）的划分方式，将对外援助划分为四类：经济类基础设施援助包括对交通、通信、能源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援助；社会类基础设施援助包括对教育、健康、供水和卫生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援助；生产部门援助包括对农业、渔业、工业、建筑业等部门的援助；政府部门援助包括债务减免、灾害管理等援助。参见王孝松、田思远：《制度质量、对外援助和受援国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第13—301页。

(OECD) 援助发展委员会 (DAC) 对外援助规模则增长得较为缓慢, 根据 Aid-Data 项目和经合组织的公开数据, 2000—2017 年, 以美元不变价计算, 中国对外援助规模增长了 204.99%, 而 OECD-DAC 国家官方对外援助总规模增长了 117.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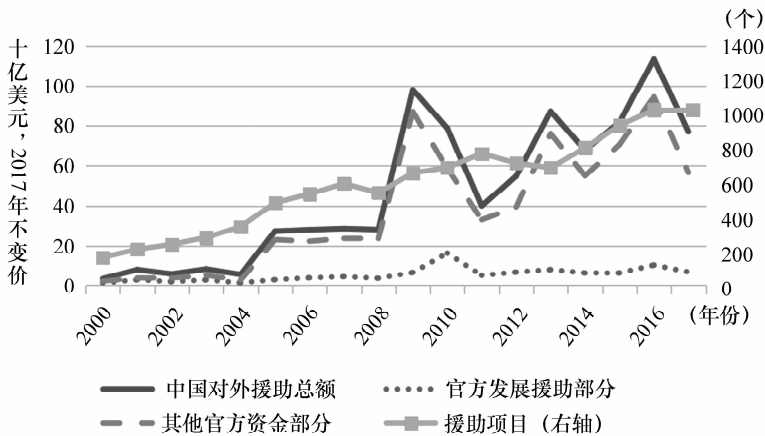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对外援助金额

注: 官方发展援助部分 (ODA-like) 指中国对外援助中, 符合 OECD-DAC 官方发展援助 (ODA) 标准的援助, 而其他官方资金部分 (OOF-like) 指中国对外援助中, 不符合 ODA 标准的援助。

资料来源:《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AidData)项目》, <https://www.aiddata.org/data/aiddatas-global-chinese-development-finance-dataset-version-2-0>。

中国的援助在多个方面有别于 OECD-DAC 国家的援助, 本文主要列举三个方面。

首先, 双方对援助的界定是不完全相同的。对 OECD-DAC 国家而言, 对外援助一般指政府开发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而有很大一部分中国对外援助不符合 ODA 标准。OECD-DAC 国家认为 ODA 是对外援助的“黄金标准”, 并认为 ODA 需满足以下要求: 其一, “由官方机构 (包括州和地方政府) 或其执行机构提供”; 其二, “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福祉为主要目标进行管理”; 其三, “具有优惠性质, 包含至少 25% 的赠款成分 (按 10% 的贴现率计算)”。^① 而中国的对外援助形式则更加多元, 包括无偿贷款、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

^① Samantha Custer, Axel Dreher and Thai-Binh Elston, et al., *Tracking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An Application of AidData's TUFF 2.0 Methodology*, Williamsburg, V. A.: AidData at William & Mary, 2021.

三类。不少中国对外援助事实上不符合西方的 ODA 标准。根据 OECD-DAC 的标准, AidData 项目将中国对外援助划分为三类:一是官方发展援助 (ODA),二是其他官方援助 (OOF),三是模糊的官方融资,其中, OOF 部分占比显著大于 ODA 部分 (见图 1)。

其次,中国对外援助是“不附加政治条件”的,^①而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则是附加政治条件的。不少中国学者认为“不附加政治条件”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与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一脉相承,这意味着中国与受援国之间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非高高在上的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②西方国家则将对外援助中的附加条件“褒义化”,认为对外援助的附加条件能够“改变或限制这些受援国的某些政治行为及政策”,希望能够通过在对外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的方式提高受援国的西式民主化和政府治理水平。^③

最后,中西方援助模式有别,中国对外援助以项目援助为主,而西方的对外援助则全面服务化。塞拉利昂一名官员曾表示“中国的参与不会附带许多专家,这些专家将拿走提供给我国的一半或 3/4 的援助”。^④这一描述体现了中西方援助风格的差异,中国看重实实在在的项目建设,而西方的援助以提供咨询等各类服务为主要形式。本文认为,中西方援助模式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各自援助理念的不同。受各自发展经验和外交理念影响,中国更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希望能增强落后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而西方国家则更关心发展中国家的政体类型,希望能帮助非民主国家实现民主转型,构建良治政府。此外,援助模式的差别也与中西方国内产业结构的差异有关。制造业在中国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中国更希望通过对外援助撬动与他在制造业部门的合作,而西方发达

① 需要指明的是,本文提及的“不附加政治条件”是指中国对外援助不要求对方做出政治上的让步与改变,进行某种符合中国诉求的政治制度改革。在实践中,中国对外援助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前提,那便是受援国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在此基础上,中国才会给予受援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对外援助。

② 熊厚:《中国对外多边援助的理念与实践》,《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49—63页;姜磊、王海军:《现行对外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差异分析——基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外援实践的比较研究》,《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19卷第7期,第53—62页;杨鸿笙,陈开明:《中国对外援助:成就、教训和良性发展》,《国际展望》2010年第1期,第46—56页;张海冰:《论中国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当代亚太》2009年第6期,第92—105页。

③ 姜磊、王海军:《现行对外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差异分析——基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外援实践的比较研究》,《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19卷第7期。

④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页。

国家更擅长高端服务业,对外援助业务也更多地由服务业部门承担,进而促使西方国家对外援助全面服务化。^①

作为非经合组织新兴援助国群体中最受关注的一个,中国对外援助的动机招致了一系列质疑。^②中方否认西方国家的指责,表示中方的援助是发展导向的,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施加附加政治条件,旨在增强受援国自主发展的能力。^③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不乏批判西方对外援助的声音,不少言论认为,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强调的是“福利与服务”而非“发展”,而且是有附加政治条件的,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受援国政治经济自主性。

总的来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双方都并不认同对方的模式。中国有句古话,听其言观其行。本文认为,面对国际舆论对中国对外援助动机的质疑,中国多年来的对外援助实践本身便是最好的回应。解读中国对外援助区位选择中的偏好,并探究偏好背后的动机,既有助于丰富对外援助相关理论,又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受援国的政治经济特征如何影响中国对外援助的区位选择?中国对外援助的区位选择与 OECD-DAC 国家存在怎样的差异?本文首先搭建了中国对外援助区位选择决策机制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利他动机和利己动机,并提出了两个核心的研究假说:一是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制造业占比负相关;二是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西式民主水平负相关。进一步地,本文综合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广义矩估计方法(GMM),探究了 2001—2017 年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制造业占比和民主水平的关系,还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偏爱工

① 王钊:《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 年第 2 期,第 51—81 页。

② 参见 Linda Jakobson,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Africa: Drivers and Constrain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9, no. 3, 2009, pp. 403–433; Sara Lengauer, “China’s Foreign Aid Policy: Motive and Method,” *Culture Mandala*, vol. 9, no. 2, 2011, p. 5899; Moises Naim, “Rogue Aid,” *Foreign policy*, vol. 159, 2007, p. 96; Gernot Pehnel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Aid Policy in Africa,”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 no. 051, 2007,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and Max Planck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p. 100; 张宏明:《中非合作:是“新殖民主义”还是平等互利?》,《学习月刊》2006 年第 23 期,第 38—40 页;叶成城:《从分歧到理性:西方学界眼中的中国对非洲援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 年第 1 期,第 159—167 页。

③ Sara Lengauer, “China’s Foreign Aid Policy: Motive and Method,” p. 5899.

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 and 西方话语体系下的非民主国家。此外，本文还考察了 OECD-DAC 对外援助的区位选择，并发现 OECD-DAC 国家偏爱自然资源禀赋优异的国家 and 西方话语体系下民主水平较高国家。本文的研究结果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援助的质疑，一方面，本文指出，中国对外援助关注受援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向制造业水平薄弱的国家伸出援手，而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更多地流向了自然资源富饶的国家；另一方面，本文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多地流向了所谓的非民主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支持治理能力差的政府，本文的实证检验反而发现中国对外援助青睐“善治”的国家。

二 文献回顾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援助广受国内外学者关注，本文文献回顾部分重点围绕“中国对外援助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这一议题展开。

有研究从理想主义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主要依据受援国自身需求选择援助目标国。韩振国重点研究了中国对外农业援助，发现中国对外农业援助的选择受不同国家“地理资源、农业发展水平、国际农业合作类”等因素影响，“显示出中国‘因地制宜、授之以渔、互利共赢’的对外农业合作理念”。^① 罗照辉分析了在新冠疫情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对外援助，指出中国对外援助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聚焦国际抗疫合作。他认为，70 年来，中国对外援助宝贵经验中的一条便是“坚持援助的南南合作属性”，“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②

多数研究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主要依据自身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大国博弈需要做出对外援助中的区位选择决策。经济利益方面，黄梅波和刘爱兰认为，经济利益是中国对外援助中的重要考量，对外援助能够促进中国产品出口，扩大自受援国产品进口，并拓展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③ 古冈文孝（Fumitaka Furuoka）对比研究了中日对非洲援助区位选择背后的影响因素，他认为

① 韩振国：《受援国因素对中国对外农业援助方式选择的影响——基于 Aiddata 数据库中国农业援助数据的分析》，《世界农业》2021 年第 6 期，第 72—80 页。

② 罗照辉：《大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13—18 页。

③ 黄梅波、刘爱兰：《中国对外援助中的经济动机和经济利益》，《国际经济合作》2013 年第 4 期，第 62—67 页。

中日对外援助,两国都偏爱市场规模和人口基数大的国家。此外,相较于中国,日本更加关注受援国的利益诉求(如医疗和卫生需求)、治理能力和政治制度。^①

在政治利益方面,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指出,多数非洲国家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国对非援助的重要动力,当然,这些国家中不乏独裁政府。^②任晓和郭小琴指出,中国对外援助的政治诉求之一是与受援国建立伙伴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交朋友,“寻求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支持”,扩大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其中,对陷入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伸出援手尤其有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③芭芭拉·斯托林斯(Barbara Stallings)认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援助以拓展伙伴关系和影响拉美民众为目的,以哥斯达黎加为例,虽然这个国家是一个小国,资源也并不富饶,但是有不可低估的国际威望,中国试图通过援助将其树立成邻国中的榜样,进而强化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④

在大国博弈方面,白云真指出,在亚太地区,中国、日本和美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中国、日本和美国都试图通过援助的方式巩固、加强与部分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⑤托马斯·卢姆(Thomas Lum)等学者将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视为“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的一部分,认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对外援助有明确的战略和外交意图,试图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benign national image),中国不断上升的软实力对美国形成挑战。^⑥萨尔瓦多·桑蒂诺·F. 雷吉尔姆(Salvador Santino F. Regilme, Jr)和奥伯特·霍兹(Obert Hodzi)指出,中美对外援助都是其实现自身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工具,通过对外援助撬动本国的市场扩张和财富积累。丹尼斯·特里尼蒂(Dennis Trinidad)剖析了中日在对菲援助中的竞争,认为亚洲地区的经济联系具有不可低估的地缘政治属性,中国试图通过援助与日本竞争在菲律宾的政治影响力,但是中

① Fumitaka Furuoka, “Determinants of China’s and Japan’s Foreign Aid Allocations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9, no. 3, 2017, pp. 376–388.

② Linda Jakobson,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Africa: Drivers and Constraints,” pp. 403–433.

③ 任晓、郭小琴:《解析中国对外援助: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55—165页。

④ Barbara Stallings, “Chinese Foreign Aid to Latin America: Trying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in Margaret Myers & Carol Wise,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 – Latin America Relations in the New Millennium—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69–91.

⑤ 白云真:《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70—87页。

⑥ Salvador Santino F. Regilme, Jr and Obert Hodzi, “Comparing US and Chinese foreign aid in the era of rising power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6, no. 2, 2021, pp. 114–131.

菲在南海的有关争议削弱了中国援助的合法性和吸引力。^①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实主义视角下，一些较为激进的观点指责中国对外援助是以资源攫取和破坏国际秩序为目的的，因此在实践中更青睐资源丰富、治理能力差的非民主国家。莫塞斯·奈姆（Moises Naim）言辞激烈地表示，中国的援助是“流氓援助”（Rogue Aid），偏爱资源丰富的地区，背后的动力是金钱、原材料和国际政治，中国使用巨额外汇储备确保原材料供给并在国际社会收买人心，开历史的倒车，破坏了西方国家努力打造的、基于市场、民主和人权等原则的国际秩序。^②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指出，中国对非援助的首要动机是获取自然资源，以满足中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③斯蒂芬·哈珀（Stefan Halper）指出，中国对外援助聚焦那些治理能力差的国家。^④格诺特·佩内尔特（Gernot Pehnelt）认为，相对于 DAC 国家，中国更青睐那些“不稳定的问题地区和流氓国家”。^⑤托马斯·卢姆（Thomas Lum）在其主持的研究报告中强调，中国对外援助首先以获取自然资源为目的，其次是实现其外交目标（如争取他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获取在国际组织内的支持等），分地区来看，中国在非洲和拉美地区的援助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而在东南亚的援助活动则与更长期的外交或战略目标有关。^⑥

反驳的观点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并没有格外青睐自然资源丰富和治理能力较差的非民主国家。阿克塞尔·特纳（Axel Dreher）和安德烈亚斯·福克斯（Andreas Fuchs）研究了中国 1956—2006 年的对外援助行为，反驳了“流氓援助”的观点，指出尽管政治因素影响中国对外援助，但是中国对政治因素的关注并没有明显高于西方国家，且中国的援助没有明显偏爱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当地的民主程度和治理水平也没有明显的相关性。^⑦黄振乾发现，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主

① Dennis Trinidad, “Strategic Foreign Aid Competition: Japanese and Chinese Assistance in the Philippine Infrastructure Sector,”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 46, no. 4, 2019, pp. 89–122.

② Moises Naim, “Rogue Aid,” p. 96.

③ Linda Jakobson,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Africa: Drivers and Constraints,” pp. 403–433.

④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⑤ Gernot Pehnel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Aid Policy in Africa”.

⑥ Thomas Lum, “China’s Assistance and Government-sponsored Investment Activities in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9.

⑦ Axel Dreher and Andreas Fuchs, “Rogue ai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Aid Alloc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vol. 48, no. 3, 2015, pp. 988–1023.

要分布在首都和相对发达地区,当地资源分布对中国援助的分布没有显著影响。^① 亚加德森·萨米(Yiagadeesen Samy)提出中国对外援助偏爱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民主国家这一观点是片面的,虽然中国确实向苏丹和津巴布韦等非民主国家提供了援助,但是中国也向毛里求斯、博茨瓦纳等民主国家提供了援助。^② 托拜厄斯·布罗赫(Tobias Broich)基于 2000—2011 年 53 个非洲国家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民主程度和制度水平没有明显的相关性。^③

总体而言,现已有不少颇具启发性的研究关注中国对外援助的区位选择,但尚存在以下不足。其一,面对国际舆论对中国对外援助动机的质疑,现有研究的普遍定位是论证西方舆论对中国对外援助的质疑是不对的,或通过展示对外援助的有效性间接回应质疑,只“破”不“立”,还不能基于中国对外援助实践,从中国自身出发,系统性地、以“我”为主地阐明中国对外援助区位选择中的偏好及其背后的动机。其二,现有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文献多数从中国自身出发,忽视了 OECD-DAC 国家对外援助偏好和受援国因素对中国对外援助区位选择的影响。其三,目前针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对外援助的效果,关注对外援助区位选择的研究相对较为欠缺。少数研究中国对外援助区位选择的定量研究主要聚焦非洲地区,而且普遍使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的数据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四,尽管中西方关于对外援助的研究不乏相互指责的声音,^④ 但少有研究能够系统性对比中西方对外援助区位选择的差异性,且目前的比较分析一般都聚焦于资源禀赋、政体类型等争议较大的因素,鲜少有研究深入讨论中国对制造业落后国家的关注。

本文的贡献在于,其一,本文在回应国际舆论质疑的同时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分析框架,既“破”又“立”。其二,本文的研究框架考虑了中国和 DAC 国家的博弈,同时将受援国的主观选择纳入分析框架。其三,本文实证检验覆盖的样本较为广泛,且使用了新近更新的对外援助数据。本文基于 2001—2017 年

① 黄振乾:《中国援助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对 21 世纪中国援非项目的空间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9 期,第 102—127 页。

② Yiagadeesen Samy, “China’s Aid Policies in Afric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Round Table*, vol. 99, no. 406, 2010, pp. 75–90.

③ Tobias Broich, “Do Authoritarian Regimes Receive More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Than Democratic On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fric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46 (C), 2017, pp. 180–207.

④ 不少中文研究认为西式对外援助口惠而实不至、附加严苛的政治条件;与此同时,不少西方研究认为中国对外援助以资源为导向,破坏国际秩序。参见王钊:《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第 51—81 页。

100 个受援国^①的数据探究了中国对外援助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考察了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其四，本文在实证检验部分对比了中国和 DAC 成员国对外援助中的区位选择偏好，具有较强的比较分析视野。

三 理论分析：受援国政治经济特征与中国对外援助区位选择

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发展经验、产业结构和国际地位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对外援助的利他和利己动机，并在综合考虑了西方国家对外援助区位选择偏好、受援国议价能力、国内政治和受西方舆论影响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关于中国对外援助区位选择偏好的两个假说（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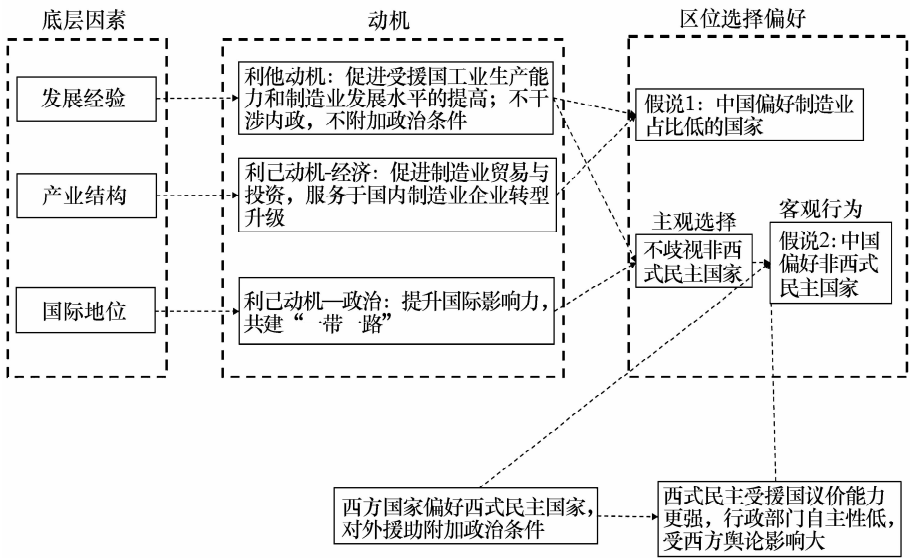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对外援助决策机制

（一）从发展经验、产业结构和国际地位到对外援助动机

本文认为，发展经验、产业结构和国际地位塑造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动机。首

① 根据数据缺失情况，在后文考虑控制变量的实证检验中，本文的实证检验覆盖 100 个经济体，在不考虑控制变量时，本文的实证检验覆盖 110 个经济体，笔者将在后文详细汇报实证检验样本数量。本文将多数中国对外援助的受援国纳入考察范围，选取样本的标准主要是数据的缺失情况。

先,中国对外援助的利他动机与中国的发展经验息息相关。制造业的发展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己及人,中国也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① 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和制造业发展水平,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② 此外,中国的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在中国融入国际市场体系的过程中,曾因政治制度的差异遇到不少阻碍。这样的经历以及中国一贯的外交理念让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包容,在对外援助中明确强调“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③

其次,本文认为,中国对外援助中经济方面的利己动机是通过援助拉动制造业贸易与对外投资促进国内制造业部门转型升级。长期以来,促进对外贸易与投资是各国对外援助的重要经济动力。^④ 2010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也是中国企业的优势所在,与制造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的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有助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撬动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扩张。另外,中国当前处在制造业转型升级阶段,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越来越难以继续生存,寻求海外生产要素成本洼地、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更需要这些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中国家,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⑤

最后,本文认为,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中国对外援助中政治方面的利己动机是扩大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提出的国际治理理念为更多国家所接受。中国的国际地位处于上升阶段,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积极

① 制造业占比是衡量工业化的重要指标。参见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经济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4—15 页;任保平、周志龙:《新常态下以工业化逻辑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社会科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35—41 页。

② 参见熊文驰:《人权、援助与发展问题——以非洲国家为例》,第 77—97 页;张建平:《中国从来不是谁的 ATM 机》,《环球时报》2018 年 8 月 20 日第 014 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第 14—32 页;王飞:《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发展、挑战及展望》,《云梦学刊》2021 年第 2 期,第 10—19 页;俞懿春、谢佳宁、李欣怡、周翱:《助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0 日第 3 版。

③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外交部、商务部令(二〇二一年第 1 号):《对外援助管理办法》, http://www.cidca.gov.cn/2021-08/31/e_1211351312.htm。

④ 毛小菁:《发达国家对外援助中的经济利益》,《国际经济合作》2009 年第 10 期,第 45—47 页。

⑤ 参见孙德升、刘峰、陈志:《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新微笑曲线理论》,《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 年第 15 期,第 49—54 页;乔山虎:《海关视角下中国部分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转移现状及对策建议》,《海关与经贸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40—56 页。

参与国际事务的、举足轻重的新兴大国，经济利益一度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动机，^①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政治利益也日益成为中国对外援助中重要的考虑因素。然而，中国的崛起引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满，^② 美国指责中国正在通过所谓的“锐实力”获取在西式民主国家内部的影响力，^③ 并在非洲、东南亚、中东欧等地区与中国竞争，遏制中国的影响力。^④ 前述国际形势决定了中国对外援助背后的政治利益，即为国际社会的发展贡献中国方案，提供公共产品，扩大国际影响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将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来，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外援助足迹的广泛性便部分体现了中国对外援助背后的上述政治利益。根据 AidData 项目的数据，2000—2017 年以来，中国曾向 145 个经济体提供对外援助。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中国的发展经验、产业结构和国际地位塑造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利他和利己动机，前者指促进受援国工业生产和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后者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方面的利己动机指拉动中国国内制造业对外贸易和投资，服务于国内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政治方面的利己动机指提升国际影响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利他动机中不包括政治动机，受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和外交理念影响，中国秉承不干涉别国内政、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原则。

（二）从动机到区位选择偏好

本文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利他动机和经济方面的利己动机，使中国在对外援助中将更多资源投入制造业占比偏低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更迫切地需要发展制造业，而且这些国家能够进口更多中国的制造业制成品、承接更多中方制造业企业的投资。而中国对外援助中政治方面的利己动机则驱使中国不因政体类型歧视受援国，尤其是不歧视受到西方排挤的受援国，通过广泛的援助提升国际影响

① 黄梅波、刘爱兰：《中国对外援助中的经济动机和经济利益》，第 62—67 页。

② 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 年第 7 期，第 24—25 页。

③ Christopher Walker, “What Is ‘Sharp Pow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9, no. 3, 2018, pp. 9–23.

④ 参见张宏明：《拜登政府的非洲政策：优先事项与本质内涵》，《西亚非洲》2022 年第 4 期，第 67—94 页；魏玲、刘淑琦：《不对称与发展自主：东南亚应对中美基建竞争》，《南洋问题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1—16 页；王弘毅：《中东欧地区大国博弈新态势——兼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国际展望》2022 年第 2 期，第 78—98 页。

力,这也与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原则相匹配。

(三) 西方国家和受援国因素的影响

笔者认为,中国不歧视政体类型的主观意愿会受到西方国家和受援国因素的影响,并表现为中国更加青睐非西式民主国家的客观现实。首先,西方的援助表现出较强的政治偏好,将更多资源向西式民主国家倾斜,而一些非西式民主国家却无法获得充分援助,如津巴布韦、斐济、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委内瑞拉等。部分国家因为无法从西方获得足够的发展援助才转而求助中国。^① 由于西方国家的“缺位”,非西式民主国家与其他同等条件的西式民主国家相比更需要援助,而中国的“补位”自然将体现为中国援助对西方语境下非民主国家的青睐。

其次,由于西方国家在对外援助中倾斜西式民主国家,而中国对政治制度没有明确的偏好,所以西式民主国家在接受对外援助时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对中国援助的需求大概率不及非西式民主国家迫切,这加大了中国与其达成合作的难度。

最后,西式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行政部门自主性越低,中国对外援助很可能招致这些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和部门的质疑,导致行政部门难以顺利批准中国对外援建项目的开展。^② 中国对外援助多数情况下采用项目援助的形式,常常涉及一些国家主权较为敏感的领域(如能源、电力、水力等^③),这可能导致西式民主国家内部对是否接受中国援助产生分歧。不仅如此,中国援建项目常常由国

① 参见 Lorenzo Piccio, “After Controversial Elections, Direct Aid to Zimbabwe in Limbo,” *Devex*, <https://www.devex.com/news/after-controversial-elections-direct-aid-to-zimbabwe-in-limbo-81572>; Tamila Varshalomidze and Arwa Ibrahim, “US Suspends Aid to Sudan After Military Seizes Power,”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10/25/sudan-army-detains-pm-hamdok-for-resisting-coup-live-news>; Simon Marks, “EU Suspends Nearly €90M in Aid to Ethiopia Over Internal Conflict,”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commission-suspends-nearly-90-million-euros-in-aid-to-ethiopia-over-internal-conflict/>; 访斐济中国问题专家马昆:《中国援助到底好不好,受援国政府与人民最有发言权》, http://www.gov.cn/xinwen/2018-02/01/content_5262953.htm; Vijay Prashad and Paola Estrada, “IMF Refuses Aid to Venezuela in Midst of Covid-19 Crisis,” *Asia Times*, <https://asiatimes.com/2020/03/imf-refuses-aid-to-venezuela-in-midst-of-covid-19-crisis>。

② 参见陈兆源:《东道国政治制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2000—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129—156页;王金波:《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2005—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当代亚太》2019年第3期,第4—28页。

③ 如基础设施项目:蒙内铁路、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缅甸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社会类基础设施:毛里塔尼亚首都供水工程、柬埔寨打井项目、坦桑尼亚查林兹供水项目;等等。

有企业承接,还撬动了国有企业对受援国的投资,^①但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并不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尤其是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性质颇为质疑,并在国际社会散播了相关言论。相对于非西式民主国家,西式民主国家更可能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对中国国有企业持负面态度。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和假说2。

假说1:受援国制造业占比越低,中国援助规模越大。

假说2:受援国西式民主化程度越低,中国援助规模越大。

四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检验假说1和假说2,本文采用OLS和GMM估计如下的线性回归模型(1)。^②

$$\ln aidchn_{it} = \beta_1 manup_{it} + \beta_2 polity_{it} + \gamma X_{it} + \alpha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在(1)式中,下标*i*表示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t*表示年份。 $\ln aidchn_{it}$ 表示中国援助规模(援助总金额加1取对数)。核心解释变量 $manup_{it}$ 表示一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是一国工业化水平的重要体现;^③ $polity_{it}$ 表示一国政体类型西式民主化程度。 X_{it} 表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结合现有研究和本文回应因果识别挑战的需要,本文设置的控制变量包括: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官方发展援助规模(援助总金额加1取对数, $\ln dac_{it}$)、制度水平($inst_{it}$)、对华关系友好程度($tochn_{it}$)、自然资源禀赋($reso_{it}$)、贸易开放度($open_{it}$)、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取对数, $\ln fdi_{it}$)、人口规模(取对数, $\ln popu_{it}$)、人均GDP水平(取对数, $\ln gdppc_{it}$)。变量的具体含义、计算方式和数据来源见表1。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 α_i 和时间固定效应 η_t 。 ε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文估计的标准误差聚类到国家层面。

① Yan Dong and Cijun Fan, "The Effects of China's Aid and Trade on Its ODI in African Countries," *Emerging Market Review*, vol. 33, 2017, pp. 1–18.

② 在使用GMM对式(1)进行检验时,等式右边还包含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被解释变量,式(2)同。

③ 参见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第4—15页;任保平、周志龙:《新常态下以工业化逻辑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第35—41页。

在检验假说 1 时, 本文对受援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援助区位选择所产生的效应的因果识别主要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其一, 受援国制造业占比低可能是因为其国民经济对采矿业等自然资源相关的行业依赖度高, 而非因其工业生产能力较弱。而且现有研究中存在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意在获取发展中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① 为回应这一质疑, 本文将受援国自然资源禀赋引入模型 (1) 作为控制变量。

其二, 存在共同的混淆因素。一国的制度水平既可能影响该国的制造业发展水平, 也可能影响中国对该国的援助规模。一方面, 有研究认为, 是落后的制度水平导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无法实现工业化。^② 另一方面, 有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援助偏爱制度水平落后的政体。^③ 为回应类似的挑战, 本文将衡量一国制度水平的变量 *inst* 引入模型 (1) 作为控制变量。此外, OECD 成员国的官方援助规模也可能是共同的混淆因素。具体而言, 或许中国的援助出于竞争的目的更多地投向发达国家青睐的援助目的地,^④ 与此同时, 发达国家的援助也可能影响受援国经济增长和制造业的发展。^⑤ 因此, 本文将 DAC 官方发展援助规模 (*Indac*) 引入模型 (1) 作为控制变量。

其三, 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和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 制造业占比可能体现的是某种不可观测因素, 即存在遗漏变量偏误。不仅如此, 可能正是中国对当地的援助影响当地制造业的发展, 也即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为尽可能地回应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了 GMM 进行估计, 并在后文汇报 GMM 估计的结果。

在检验假说 2 时, 本文面临着类似的关于因果识别的挑战。一是政体类型可能体现的是一国的制度建设水平而非西式民主化水平。不少西方研究认为, 民主

① Moises Naim, “Rogue Aid,” p. 96.

② 参见 Rehman Sobhan, “How Bad Governance Impedes Poverty Alleviation in Bangladesh,”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s*, no. 143, 1998, OECD Publishing: Paris; Kingsley Ufuoma Omoyibo, “Leadership, Governance, and Poverty in Nigeria,”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4, no. 6, 2013, p. 29.

③ 参见 Moises Naim, “Rogue Aid,” 2007; 叶成城:《从分歧到理性: 西方学界眼中的中国对非洲援助》。

④ 参见 Robert A. Blair, Robert Marty and Philip Roessler, “Foreign Aid and Soft Powe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Afric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2, no. 3, 2022, pp. 1355 – 1376; Claire Amuhaya and Denis Degterev, “Foreign Aid as Foreign Policy Tool: Competition of Projects Aid Allocation to Kenya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Asia and Africa Today*, vol. 12, 2019, pp. 68 – 74.

⑤ 参见 David H. Bearce and Daniel C. Tirone, “Foreign Aid Effectiveness and the Strategic Goals of Donor Govern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2, no. 3, 2010, pp. 837 – 851; John Loxley and Harry A. Sackey, “Aid Effectiveness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0, no. 2, 2008, pp. 163 – 199.

与“善治”高度相关。^①此外，政体类型也可能体现了受援国与中国的政治联系而非西式民主化水平。部分研究认为，非西式民主国家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更加密切。^②为回应这一挑战，本文将衡量一国制度水平的变量 *inst* 和衡量受援国对华关系友好程度的变量 *tochn* 引入（1）式作为控制变量。

二是共同的混淆因素。自然资源禀赋被认为既可能与政体类型有关，又可能与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有关。一方面，部分关于政治资源诅咒的文献认为，依赖自然资源的独裁国家更难转化为西式民主国家。^③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不少国际舆论质疑中国对外援助是以获取受援国自然资源为目的的。为回应这一挑战，本文将衡量一国自然资源禀赋的变量 *reso* 引入（1）式作为控制变量。

三是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政体类型可能体现的是某种不可观测因素，即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认为中国的援助助长了腐败和独裁，因此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④针对可能的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了 GMM 估计方法，并在后文一并汇报 OLS 与 GMM 的估计结果。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含义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受援国的援助规模是笔者由 2021 年 9 月更新的美国威廉玛丽学院 AidData 项目^⑤获取的。本文各变量的具体名称、含义和计算方式、数据来源如表 1 所示，本文实证检验使用各变量年度数据，考虑到数据的缺

① 参见 Lysias Dodd Gilbert and Fidelis Allen, “Democracy and Good Governance: The Missing Link in Nigeria,”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5, no. 16, 2014, p. 524; Daniel Stockemer, “Does Democracy Lead to Good Governance? The Question Applied to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 21, no. 2, 2009, pp. 241 – 255.

② 参见 Linda Jakobson,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Africa: Drivers and Constraints,” pp. 403 – 433; 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 and Andrew Small, “China’s New Dictatorship Diplomacy-Is Beijing Parting with Pariahs,” *Foreign Affairs*, vol. 87, 2008, p. 38.

③ 参见 James A. Robinson, Ragnar Torvik and Thierry Verdier,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Resource Curs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9, no. 2, 2006, pp. 447 – 468; David Wiens, Paul Poast and William Roberts Clark, “The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 an Empirical Re-evalu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7, no. 4, 2014, pp. 783 – 794.

④ 参见 Ann-Sofie Isaksson & Andreas Kotsadam, “Chinese Aid to Africa: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nd Local Effects,” *CESifo Forum, ifo Institute-Leibniz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Munich*, vol. 21, no. 2, 2020, pp. 27 – 31; Moises Naim, “Rogue Aid,” p. 96.

⑤ Samantha Custer, Axel Dreher, Thai-Binh Elston, et al., *Tracking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An Application of AidData’s TUFF 2.0 Methodology*, 2021, Williamsburg, V. A. : AidData at William & Mary.

失情况，实证检验的取值区间为 2001—2017 年。表 2 是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变量名称、含义与数据源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lnaidchn_{it}$	$lnaidchn_{it}$ 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对数，数值越大，援助规模越大，反之则越小。考虑到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存在缺失值和零值， $lnaidchn_{it} = \ln(aidchn_{it} + 1)$ ，其中， $aidchn_{it}$ 表示中国 t 年对 i 国的援助金额，计价单位是百万美元（2017 年不变价）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 AidData 项目
解释变量	$manup_{it}$	$manup_{it}$ 是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衡量一国制造业发展水平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polity_{it}$	$polity_{it}$ 是受援国政体类型，取值越大，民主程度越高	多样性民主（V-Dem）项目①
控制变量	$lndac_{it}$	$lndac_{it}$ 是 OECD-DAC 国家对外援助的规模对数，数值越大，援助规模越大，反之则越小。考虑到 DAC 国家对外援助金额可能有零值和缺失值，取 $lndac_{it} = \ln(dac_{it} + 1)$ 表示他国对 i 国的援助规模，其中，DAC 国家对受援国的援助金额为 dac_{it} ，计价单位是百万美元（2017 年不变价）	OECD 数据库
	$inst_{it}$	$inst_{it}$ 表示受援国制度建设水平，是言权自由（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度（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ism）、政府治理有效性（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管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制水平（Rule of Law）、政府清廉度（Control of Corruption）6 个指标的平均值	世界银行 WGI 数据库
	$tochn_{it}$	$tochn_{it}$ 表示受援国对华关系友好程度。本文将受援国作为施动者，中国作为被动者，计算一定时段内的戈德斯坦得分平均值，用于衡量受援国对华关系友好程度。戈德斯坦得分来源于“全球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GDELT）”，该得分能够表示双边互动事件体现的合作或冲突程度，得分越大，施动者与被动者的合作程度越高，冲突程度越低，取值范围为 -10 到 10② 本文将受援国作为施动者，中国作为被动者，计算一定时段内的戈德斯坦得分平均值，以衡量受援国对华关系友好程度	GDELT 数据库

① 本文使用多样性民主（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项目公布的选举民主指数（v2x_polyarchy，取值区间为 0—1）衡量受援国政体类型。参见：Varieties of Democracy（V-Dem），<https://www.v-dem.net>。该项目提供的民主指数更新较为及时，使用该项目提供的指数的研究有：杨竺松、陈冲、杨靖溪：《“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的国家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3 期，第 4—29 页；陈冲：《全球外交访问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基于大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1 年第 4 期，第 120—154 页。

② 参见庞珣、刘子夜：《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5 期，第 53—79 页；沈石、长青、程昌秀、高剑波、叶思菁：《GDELT：感知全球社会动态的事件大数据》，《世界地理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71—76 页。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控制变量	$reso_{it}$	$reso_{it}$ 是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的百分比（%），可用于衡量一国自然资源禀赋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open_{it}$	$open_{it}$ 是进出口总额占 GDP 百分比（%），可用于衡量一国贸易开放度	
	$\ln fdi_{it}$	$\ln fdi_{it} = \ln(FDI_{it} + (1 + FDI_{it}^2)^{\frac{1}{2}})$ 其中，FDI 是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计价单位是百万美元（2017 年不变价）	
	$\ln popu_{it}$	$\ln popu_{it}$ 国家总人口数的对数	
	$\ln gdppc_{it}$	$\ln gdppc_{it}$ 是人均 GDP 水平的自然对数，人均 GDP 的计价单位是千美元（2017 年不变价）。	

注：AidData 报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aidchn）是 2017 年不变价美元，OECD 报告的 DAC 对外援助金额（dac）是 2020 年不变价百万美元，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报告的 FDI 流量（fdi）和人均 GDP（gdpc）是 2015 年不变价美元，本文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报告的 GDP 平减指数，将 aidchn、dac 和 fdi 的计价单位调整为百万美元（2017 年不变价），将 gdpc 的计价单位调整为千美元（2017 年不变价），经过调整，本文可以较好地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表 2 描述性统计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lnaidchn	1921	2.951	2.629	0	2.656	10.49
lnaidchn_ Euroasia	884	2.959	2.773	0	2.387	10.49
lnaidchn_ Latin	323	2.549	2.840	0	1.333	10.14
lnaidchn_ Africa	714	3.124	2.313	0	3.072	8.530
manup	1733	12.23	7.027	0.233	11.55	49.88
manup_ Euroasia	786	13.52	7.820	0.721	13.04	49.88
manup_ Latin	309	11.81	5.065	1.588	13.06	25.31
manup_ Africa	638	10.84	6.513	0.233	9.452	40.81
polity	1860	0.448	0.220	0.0670	0.435	0.916
polity_ Euroasia	867	0.376	0.190	0.0700	0.348	0.775
polity_ Latin	289	0.706	0.190	0.115	0.768	0.916
polity_ Africa	704	0.429	0.186	0.0670	0.428	0.792
lndac	1892	3.670	2.701	-2.120	4.389	10.18
tochn	1829	2.554	1.310	-10	2.723	9

续表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nst	1903	-0.312	0.691	-1.977	-0.395	1.657
reso	1858	10.07	12.27	0.001	5.628	87.58
open	1854	78.06	39.62	0.218	71.61	348.0
lnfdi	1803	6.712	3.171	-9.657	7.127	11.91
lnpopu	1915	16.02	1.805	11.25	16.20	21.02
lngdppc	1847	0.935	1.086	-1.324	0.977	3.627

注：表 2 中 Euroasia 表示欧亚和北非地区的国家；Latin 表示拉丁美洲国家；Africa 表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后文针对不同地区的检验将详述地区划分的依据和各地区囊括的经济体。

五 实证检验结果

（一）基准回归和 GMM 估计结果

本文分别使用 OLS 和系统 GMM 对（1）式进行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3。

表 3 基准回归和 GMM 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lnaidchn			
	OLS			系统 GMM
	(1)	(2)	(3)	(4)
1. lnaidchn				0.133 ***
				(3.93)
12. lnaidchn				0.086 **
				(2.48)
manup	-0.076 **		-0.077 ***	-0.043 ***
	(-2.33)		(-2.68)	(-2.80)
polity		-2.339 ***	-2.819 ***	-1.892 **
		(-2.84)	(-3.08)	(-2.53)
lndac			0.073	0.110
			(0.81)	(1.22)

续表

	被解释变量：lnaidchn			
	OLS			系统 GMM
	(1)	(2)	(3)	(4)
inst			0. 913 *	-0. 291
			(1. 67)	(-0. 97)
tochn			0. 108 **	0. 031
			(2. 24)	(0. 36)
reso			0. 004	-0. 011
			(0. 26)	(-0. 86)
open			0. 008 **	0. 007
			(2. 25)	(1. 62)
lnfdi			-0. 009	0. 003
			(-0. 37)	(0. 07)
lnpopu			1. 245	0. 248 *
			(1. 03)	(1. 73)
lngdppc			0. 588	0. 117
			(0. 99)	(0. 72)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 978 ***	2. 984 ***	-17. 030	-0. 977
	(6. 68)	(8. 20)	(-0. 87)	(-0. 34)
观测值数量	1733	1860	1505	1421
拟合优度	0. 4345	0. 4134	0. 4448	
AR (1)				0. 000
AR (2)				0. 360
Sargen 检验值				0. 162

注：(1) 括号内是 t 统计量的值（表4、表5、表6同）；

(2)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表4、表5、表6同）；

(3) 在 GMM 估计中，除年份虚拟变量外，其他变量将作为内生变量处理，以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表5同）；

(4) AR (1) 和 AR (2) 两行分别报告对一阶差分后的残差进行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得到的 p 值（表5同）；

(5) Sargan 检验值一行报告的是该检验得到的 p 值，由于工具变量数目较多，本文汇报 Sargen 检验值（表5同）。

如表 3 所示,本文实证研究结果支持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两个研究假说。具体而言,其一,假说 1 成立,受援国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低,中国援助规模越大,这一研究结果体现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工业化水平的关切,符合前文理论分析的结果。其二,假说 2 成立,非西式民主国家更可能得到中国的援助,符合前文理论分析的结果。

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发现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治理水平在 90% 置信度下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中国对外援助并非以纵容和助长腐败为目的。不仅如此,这一研究结果也证明,虽然中国援助确实更多地流向了西式非民主国家,但是非西式民主与治理能力差是不完全等同的概念,西式民主程度高并不意味着政府治理能力强,倾斜非西式民主国家并不意味着照顾政府治理能力差的国家。西式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自身价值观的输出,带有主观性,而政府治理能力是相对客观的。在一些西式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反而出现了政府运转失灵、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盛行等现象,政府治理能力十分有限。^①由此可见,中国对外援助流向非西式民主国家和中国对外援助助长腐败是具有根本区别的两种观点,前者符合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和现实观察,后者不符合。此外,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受援国对华关系友好程度与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正相关,也即政治联系确实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考量因素。最后,本文发现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自然资源禀赋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换言之,中国对外援助不是以获取受援国自然资源为目的的。这一实证检验结果反驳了中国对外援助以攫取海外资源为目的的国际舆论。

(二)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检验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以下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一,使用中国对外援助中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援助的规模(援助总金额加 1 并取对数,分别记为 $\ln aidoda_{it}$ 和 $\ln aidooft_{it}$, 其中, $\ln aidoda_{it} =$

① 参见马正义:《西式民主的困境:基于台湾地区政治实践的分析》,《现代台湾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44—49 页;张程:《揭穿西式选举民主的“神话”》,《红旗文稿》2017 年第 4 期,第 8—11 页;沈跃萍:《西式民主缘何失灵——国外学者关于当前西式民主危机的解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 年第 4 期,第 189—196 页。

$\ln(aidoda_{it} + 1)$, $\ln(aidoof_{it} + 1)$) 作为被解释变量。如图 1 所示, 有大量中国对外援助不符合 OECD-DAC 的标准, 这体现了中国对外援助形式之多样以及与西方援助存在鲜明差异的事实。本文分别使用 $\ln aidoda_{it}$ 和 $\ln aidoof_{it}$ 替代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对 (1) 式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其二, 使用 V-Dem 数据库提供的 5 种民主指数 (5 个指数分别为选举民主指数、自由民主指数、参与式民主指数、协商式民主指数、平等式民主指数) 的平均值替换 polity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记为 $demo_{it}$ 。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 aidoda$	被解释变量: $\ln aidoof$	被解释变量: $\ln aidchn$
	(1)	(2)	(3)
manup	-0.044 **	-0.030	-0.077 ***
	(-2.33)	(-0.92)	(-2.69)
polity	-0.754	-3.642 ***	
	(-1.11)	(-3.67)	
demo			-3.679 ***
			(-3.19)
ln dac	-0.003	0.055	0.072
	(-0.05)	(0.62)	(0.79)
inst	0.740 **	0.983 *	0.923 *
	(2.07)	(1.82)	(1.69)
tochn	0.077 *	0.077	0.109 **
	(1.96)	(1.50)	(2.26)
reso	0.009	0.007	0.004
	(0.67)	(0.45)	(0.27)
open	0.005 *	0.006 *	0.008 **
	(1.67)	(1.72)	(2.21)
ln fdi	-0.001	0.007	-0.009
	(-0.05)	(0.30)	(-0.37)
ln popu	1.414 *	1.983	1.142
	(1.69)	(1.43)	(0.94)

续表

	被解释变量: lnaidoda	被解释变量: lnaidoof	被解释变量: lnaidchn
	(1)	(2)	(3)
lngdppc	0. 260	1. 160 *	0. 562
	(0. 51)	(1. 80)	(0. 94)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21. 033	- 30. 692	- 15. 364
	(- 1. 55)	(- 1. 37)	(- 0. 78)
观测值数量	1505	1505	1505
拟合优度	0. 3907	0. 4193	0. 4198

其三，本文在使用最小二乘法之外还使用了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样本进行估计，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总之，本文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前文所得出的研究发现是稳健的，前文提出的假说 1 和假说 2 都成立。此外，稳健性检验结果还显示，分类来看，中国对外援助中的官方发展援助更加倾斜制造业发展水平低的受援国，而其他官方援助则更加倾斜非西式民主国家。而不论是官方发展援助还是其他官方援助，都偏好政府治理能力较强或对华关系友好的受援国，但都与受援国自然资源禀赋无关。由此进一步夯实了前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即中国对外援助虽偏好非西式民主政体和与中国有紧密政治联系的国家，但并不助长腐败，也不以攫取自然资源为目的，反而更加青睐治理能力较强的受援国。

(三) 跨国比较

为比较中国和西方国家对外援助偏好的差异，本文构建（2）式， $ln dac_{it}$ 是被解释变量， $manup_{it}$ 、 $polity_{it}$ 是核心解释变量， Z_{it} 表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 $ln aidchn_{it}$ 、 $reso_{it}$ 、 $open_{it}$ 、 $ln fdi_{it}$ 、 $tousa_{it}$ 、 $inst_{it}$ 、 $ln popu_{it}$ 和 $lngdppc_{it}$ ； α_i 、 η_t 、 ε_{it} 的含义与（1）式相同。 $tousa_{it}$ 是本文根据 GDELT 数据库提供的戈德斯坦得分计算的各国对美关系友好度，以此近似评估受援国与西方援助国的政治联系。

$$ln dac_{it} = \beta_3 manup_{it} + \beta_4 polity_{it} + \delta Z_{it} + \alpha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2)

表 5 DAC 对外援助实证检验基准回归和 GMM 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ln _{dac}				
	OLS				系统 GMM
	(1)	(2)	(3)	(4)	(5)
l. ln _{dac}					0.636 ***
					(8.69)
l2. ln _{dac}					0.000
					(1.04)
manup	-0.013			0.009	-0.005
	(-0.48)			(0.50)	(-0.58)
polity		2.138 **		1.902 **	0.474 **
		(2.62)		(2.18)	(2.56)
lnaidchn				0.021	-0.005
				(1.25)	(-0.41)
inst				-0.094	-0.129
				(-0.29)	(-1.27)
tousa				0.009	-0.018
				(0.35)	(-0.71)
reso			0.014 *	0.026 **	0.008 **
			(1.73)	(2.58)	(2.08)
open				0.005 ***	0.002
				(2.81)	(1.24)
lnfdi				0.004	-0.000
				(0.21)	(-0.04)
lnpopu				-0.447	0.306 ***
				(-0.61)	(3.23)
lngdppe				0.602	-0.236 ***
				(1.35)	(-3.77)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997 ***	3.954 ***	4.751 ***	10.214	-3.289 ***
	(13.28)	(11.23)	(38.10)	(0.88)	(-2.74)

续表

	被解释变量: Indac				
	OLS				系统 GMM
	(1)	(2)	(3)	(4)	(5)
观测值数量	1217	1321	1299	1091	1017
拟合优度	0.7494	0.7241	0.7174	0.7626	
AR (1)					0.000
AR (2)					0.144
Sargen 检验值					0.266

注：样本较前文更少是因为接受 OECD-DAC 援助的国家更少。

如表 5 所示，本文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OECD-DAC 的援助与一国制造业发展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然而，西方对外援助对自然资源禀赋优异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偏好。这一实证检验结果也与部分受援国的反馈符合。一位尼日利亚外交官曾表示“中国人正在试图涉足我们经济的各个领域，如果你去看一下西方人，除了石油，石油，石油之外，没有别的东西”。^① 简言之，在对外援助中将获取自然资源作为区位选择标准之一的或许是西方国家而非中国。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让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更感兴趣，对资源的锁定只是保障基础设施贷款偿还的一种方式而已。事实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受援国获取到的很多资源并没有运回中国，而是高价出售到其他地方，锁定资源收入是中国实现基础设施项目正常运营的手段，而非中国前往受援国的首要目的。^②

在政治制度方面，OECD-DAC 对西式民主国家表现出强烈的倾斜，这一数据发现与西方国家对外援助实践中对受援国政治制度的关注密切相关。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构建西式民主制度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权的重要前提。基于此理念，构建西式民主国家也成为获取西方国家援助的重要前提。如前文理论分析部分所述，西方国家在对外援助实践中对政体类型这一特征的关注，也间接导致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西式民主水平显著负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OECD-DAC 援助规模与受援国治理水平在 90% 置信度下不显

①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第 264 页。
②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第 261—265 页。

著,且受援国治理水平的系数为负。这一研究结果说明,西方国家在对外援助中强调西式民主水平,以价值观输出为导向,但对受援国的治理能力没有特别的关注。此外,结合西方国家援助规模与受援国民主水平显著正相关的事实,上述检验结果进一步说明,西式民主水平和一个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是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

对比以上关于中国对外援助和西方对外援助区位选择的实证检验,本文发现中西方对外援助的区位选择偏好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其一,中国对外援助青睐制造业占比低的国家,而西方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制造业占比无关;其二,西方对外援助将资源更多地倾斜给自然资源禀赋优越的国家,而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自然资源禀赋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三,中国对外援助更多地投向非西式民主国家,西方国家则恰恰相反。综合以上三点可知,中西方对外援助不是对立的,两国在区位选择偏好上是互补的,有一定的合作空间。

(四) 分区域检验

为检验中国对外援助偏好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本文进一步加入地区虚拟变量,如(3)式和(4)式所示。

$$\begin{aligned} \ln ai \ dchn_{it} = & \beta_3 manup_{it} \times Eurasia_i + \beta_6 manup_{it} \times Latin_i + \beta_7 manup_{it} \\ & \times (1 - Euroasia_i) \times (1 - Latin_i) + \beta_8 polity_{it} + \gamma X_{it} \\ & + \alpha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3)$$

$$\begin{aligned} \ln aidchn_{it} = & \beta_9 manup_{it} + \beta_{10} polity_{it} \times Eurasia_i + \beta_{11} polity_{it} \\ & \times Latin_i + \beta_{12} polity_{it} \times (1 - Euroasia_i) \times (1 - Latin_i) \\ & + \gamma X_{it} + \alpha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4)$$

为检验中国对外援助在不同区域的差异,根据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地理区域的划分,本文将受援国划分为三个区域,分别是欧亚北非国家、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①并引入两个虚拟变量,分别是 $Euroasia_i$ 和 $Latin_i$,当受援

① 欧亚北非国家指世界银行地区划分中,中东北非地区、欧洲和中亚地区、南亚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44个经济体;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指世界银行地区划分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等41个经济体;拉美国家指世界银行地区划分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等15个经济体。需要说明的是,北部非洲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人种、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北部非洲与中东地区、欧洲地区的联系非常密切,且世界银行将中东和北非国家统一归入中东北非地区。因此,本文将北非国家归入欧亚北非地区。

国是欧亚北非国家时, $Euroasia_i = 1$, $Latin_i = 0$; 当受援国是拉丁美洲国家时, $Euroasia_i = 0$, $Latin_i = 1$; 当受援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时, $Euroasia_i = Latin_i = 0$ 。在 (3) 式中, β_5 、 β_6 、 β_7 分别反应欧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国家制造业占比与中国援助规模之间的相关性; 在 (4) 式中, β_{10} 、 β_{11} 、 β_{12} 分别反应欧亚北非、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体民主化程度与中国援助规模的相关性。(3) 式和 (4) 式中 X_{it} 、 α_i 、 η_t 和 ε_{it} 的含义与 (1) 式、(2) 式相同。此外, 本文还使用各地区国家的样本分别基于 (1) 式进行了检验。针对 (3) 式、(4) 式和使用不同样本对 (1) 式进行检验的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分区域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aidchn				
	全部样本		欧亚北非国家	拉美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1)	(2)	(3)	(4)	(5)
manup × Euroasia	−0.036				
	(−0.94)				
manup × Latin	−0.292 ***				
	(−4.02)				
manup × (1 − Euroasia) × (1 − Latin)	−0.067 *				
	(−1.74)				
manup		−0.074 ***	−0.027	−0.250 ***	−0.093 **
		(−2.65)	(−0.67)	(−4.46)	(−2.20)
polity × Euroasia		−3.013 ***			
		(−2.95)			
polity × Latin		−16.179 ***			
		(−3.08)			
Polity × (1 − Euroasia) × (1 − Latin)		−0.564			
		(−0.44)			
polity	−2.741 ***		−2.765 ***	−19.290 ***	−0.538
	(−3.06)		(−2.71)	(−4.72)	(−0.46)
lndac	0.079	0.071	0.079	0.098	0.184
	(0.84)	(0.78)	(0.60)	(0.48)	(0.99)

续表

	被解释变量：lnaidchn				
	全部样本		欧亚北非国家	拉美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1)	(2)	(3)	(4)	(5)
tochn	0.827	0.994 *	0.274	1.783	0.892
	(1.57)	(1.79)	(0.37)	(1.09)	(1.23)
inst	0.105 **	0.105 **	0.173 *	0.053	0.060
	(2.18)	(2.19)	(1.69)	(0.63)	(1.01)
reso	0.003	0.005	-0.028	-0.015	0.015
	(0.20)	(0.34)	(-1.00)	(-0.20)	(0.77)
open	0.008 **	0.007 *	0.006	0.017	0.008 *
	(2.13)	(1.89)	(0.93)	(1.14)	(1.71)
lnfdi	-0.011	-0.011	0.072 **	-0.077	-0.057
	(-0.44)	(-0.42)	(2.11)	(-1.31)	(-1.50)
lnpopu	1.419	0.813	1.234	-7.216	5.751 **
	(1.22)	(0.66)	(0.63)	(-1.39)	(2.42)
lngdppc	0.629	0.606	0.755	0.978	0.570
	(1.05)	(1.02)	(0.80)	(0.50)	(0.6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9.719	-8.759	-18.741	130.037	-87.881 **
	(-1.05)	(-0.44)	(-0.57)	(1.60)	(-2.36)
观测值数量	1505	1505	647	234	624
拟合优度	0.4461	0.4464	0.5254	0.3659	0.3544

如表 6 所示，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地区层面，中国对欧亚北非国家的援助更加青睐西方话语体系下的非民主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援助更加青睐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的或西方话语体系下的非民主国家，而中国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援助更加偏爱制造业薄弱的国家。本文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偏好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可能是现有关注非洲地区的实证研究没有发现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民主水平负相关性的原因之一。

六 结论与讨论

对外援助是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南南合作”的重要形式，也是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依托。多年来，中国以“发展”为导向，不干涉受援国内政，不附加条件地援助得到了受援国的广泛欢迎，但也引发了不少来自西方国家的质疑。

笔者尝试探究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政治经济特征之间的关联。本文理论分析部分指出，中国的发展经验、产业结构和国际地位塑造了中国对外援助中的利他动机和利己动机，这些动机与西方国家对外援助偏好和受援国自身因素一道决定了中国对外援助中的区位选择偏好，即倾斜制造业占比低的国家和非西式民主国家。对外援助向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倾斜，既有助于提升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符合中国对外援助中的利他动机，又有助于深化中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制造业贸易和投资合作，缓解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日益提升的压力，符合中国对外援助中经济方面的利己动机。此外，中国对外援助的利他动机中没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即不明确地表示希望受援国在政治制度上做出特定的调整；政治方面的利己动机也要求中国在对外援助中不干涉内政、不歧视非西式民主国家。但考虑到西方国家对外援助在非西式民主国家的“缺位”和西式民主受援国议价能力强、行政部门自主性低、受西方舆论影响大等因素，本文判断中国对外援助在实践中更加倾向非西式民主国家。

本文实证检验支持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说，检验结果显示，经济结构方面，中国对外援助倾向于投向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换言之，中国对外援助关注受援国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工业化水平，这一点从中国对外援助以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性部门援助为主的事实中也可略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自然资源禀赋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即西方对中国援助意在掠夺资源的质疑是不成立的。政体类型方面，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与受援国西式民主化程度负相关，与政府治理能力正相关。此外，本文比较分析了 OECD-DAC 国家的对外援助区位选择偏好，发现西方国家对外援助明显青睐西式民主国家和自然资源禀赋优越的国家，但对政府治理能力没有明显的偏好。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中国对外援助偏好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检验结果显

示，中欧在欧亚北非地区的援助规模与受援国西式民主水平显著负相关，与受援国制造业占比无关；对拉美地区的援助规模与受援国制造业占比和西式民主水平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与受援国制造业占比显著负相关，与受援国西式民主水平无关。

事实上，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政体类型，中西方对外援助区位选择的差异性蕴含了互补与合作的可能性，双方的合作将对全球的稳定与发展有益。西方国家强调受援国的民主化水平，将对外援助视为一种强化西方治下的国际秩序的工具，对外援助全面服务化，并不十分关注制造业部门，而中国则关注制造业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不歧视政体类型，愿意向非西式民主国家伸出援手，中国可以帮助急需经济支持的非西式民主国家渡过难关，避免极端贫困等原因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动荡。

本文认为，西方之所以对中国援助有诸多怨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存在为非西式民主落后国家提供了西方援助之外的其他选择，使其无须在亟须援助支持时被迫改变自身政治体制。中国学界和政策界在被动回应中国没有助长腐败、不以掠夺资源为目的的同时，也应当指明西方言论背后的意图，讲好中国对外援助的故事，并指明中西方对外援助模式的差异性蕴含着双方互补与合作的可能。